



党的地下尖兵任远

□ 谢文雄

卫电台，便衣队战士平日就扮成乡长家中的长工。这使敌伪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的电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经过半年的努力，任远领导下的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不仅与秦皇岛等冀东周边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系，还向奉天、哈尔滨等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派出几十名情报人员，初步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情报网，搜集了许多伪满洲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

1944年10月16日，日军秘密集结战斗力较强而且装备先进的一个旅团，从唐山、丰润、昌黎等地分头向北进犯，企图一举歼灭我军首脑机关。这次战斗仅120余人突围，牺牲了包括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在内430余人。

在这次突围行动中，任远由于两臂中弹，昏迷过去。任远被捕时上衣小口袋里有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很多当时党内军内重要情报关系的联络暗号、代号，还有秘密联络的地点与方法，以及他们自创的姓名、地点等绝密材料，这份材料原来分别由钟子云、任远和译电员方明各保存一份。任远被捕后，想将这份材料取出销毁，但由于受伤，手指像木条儿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衣扣。于是，任远忍着痛，想方设法轻声唤醒离他最近的一位老乡，恳求他帮忙。之后任远艰难地把有字的纸撕下，吃力地送进嘴里嚼烂，用干涩的喉咙慢慢地咽下去，利用这样既原始又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保守了机密，使他可以放心应对随之而来的敌特搜审。

1945年2月，党组织通过直接领导的单线地下关系，营救任远出狱，重回冀东根据地。1946年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有关负责同志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审查任远的相关材料，经过慎重研究，作出正式恢复他党籍的决定。

专列安保 绝对负责

1949年12月初，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毛泽东将乘专列赴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此次是毛泽东首次出国，安全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虽已获得解放，但全国战争尚未结束，且毛泽东乘车途经的区域大部为新区，铁路沿线的治安还不稳定，特别是潜伏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尚未被肃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为保证毛泽东专列的绝对安全，早在11月25日，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召集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以及担任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的任远，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来的指示，要求他们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出发前全部准备工作，保证“三个绝对”：绝对保密，绝对负责，绝对安全。

铁道部公安局等有关部门下令各地铁路局，在当地省、市、县委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的特点，统一调度已有的现代设备，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11月26日，任远同工兵部队一起，赶赴停放专列的北京铁路局东部河北大厂，用雷达对专列的每节车厢逐个进行技术检查。毛泽东专列是在接收的原国民党列车加以全面改造而成的新中国的第一列专用列车，原计划就准备供毛泽东外出乘用。列车一共有9节客用车厢，加上餐车共10节，机车则可以沿途随时更换。

任远还组织进行了由铁道部派专人检验的几次预演。经过这些紧张有序的工作，在出发前两天，整个列车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专列驶入待命的线路上，保证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2月2日下午，上级通知专列拟于当晚9时出发。晚上约8时30分，毛泽东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登上北京火车站站台，在周恩来亲自陪同、滕代远引导下上了专列。他边走边满面微笑地频频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致意。当时，因为要求严格保密，站台上空无一人，仅专列车门口两侧分别站着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任远等警卫人员。

晚9时整，在“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专列开出北京站。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出的第一组由新政权生产的火车，又是由毛泽东首次乘坐进行首次出国访问，任远私下开玩笑地把滕代远称为第一专列的首任“列车长”，杨奇清、冯纪为首任正副专列“警长”，而他本人由于具体负责专列的安保工作，就是首任专列的“警卫员”。

在整个护送毛泽东出国访苏的过程中，任远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如此：从北京出发到满洲里，只要专列驶驶，不管是入站、上煤上水还是换乘机车，任远必定下车在专列的主席车厢周围巡视。一方面方便监督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则可以顺便向当地安全保卫的相关部门同志了解本地采取的安保措施，并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沟通，通报情况。

几天后，新华社即授权发布了毛泽东安全抵达莫斯科访问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

誓与阵地共存亡

——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 侯 悦

们，永垂不朽！

锦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立

碑文不到600字，强调了这场阻击战的重要意义，再现了解放军战士们鏖战塔山、坚守阵地、奋勇抗敌的战斗历程，彰显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

官兵一心 死守阵地

塔山阻击战是我军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打破了蒋介石增援锦州的计划，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在整个辽沈战役中的胜局。

塔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仅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距葫芦岛不足10公里，离锦州约30公里。塔山更是无险可守，仅为一条宽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公路、铁路贯穿其中。从战略意义上讲，塔山是国民党军北上支援锦州的咽喉要道，能否守住塔山事关整个辽沈战役的成败。1948年蒋介石亲赴葫芦岛督战，国民党军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坐镇指挥，妄图突破塔山阵地。当时敌军居高临下，地形对敌有利，我军作战准备时间紧，并没有坚固完整的作战准备阵地。与此同时，敌军的兵力大于我军数倍，更有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而我军只能以单一兵种进行防御。

战前四纵队召开了阵前士兵代表大会，四纵队党委发布了《致全体共产党员信》《告全纵队指战员书》，号召“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阵地上到处写着“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等标语。这些标语和口号，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彰显了战士们坚守阵地、顽强抵抗的决心。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当众宣誓：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十师政委李丙令在干部会上庄重承诺：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我誓与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动摇！三十四团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更是留下遗嘱：“如果牺牲了，就把我

埋在阵地上”。参战部队抱着必死的决心，进阵地就没想过活着回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中，“跟我上”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官兵一心、团结一致、共克强敌的强大战斗力。

精密部署 灵活抗敌

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了解地形以及明确自己的任务后，四纵队定下阵地防御的策略。通过分析研判，我军主要兵力应在塔山桥、塔山堡和刘家屯北高地这三点进行重点防御，守住这三个重要阵地，既增大了我军阵地的纵深，有利于节省守备兵力，同时也可以制止其炮兵不敢靠前，有利于我军灵活机动。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国民党军队在军舰、飞机、重炮的掩护下，时而中央突破、两翼配合，时而两翼突破、夹击塔山，时而三路出击，甚至全面铺开，偷袭与强攻等手段并用。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我军不断调整策略积极应对，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了再修。面对敌人的冲击，实施猛烈的反冲击，将敌人赶了回去。利用夜间插入敌后侦察、设伏，捕获了国民党的一位副团长，获取了敌军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惟幕。东北野战军首长给四纵队发嘉勉信，认为塔山阻击战是“英勇顽强的防御战”，创立了坚守防御的模范。

勇于牺牲 敢于斗争

面对枪林弹雨，勇于牺牲的精神融入了战士们行动中，化作最坚切的防御，捍卫着每一寸阵地。10月11日在大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三十六团官兵英勇抵抗。四连五班班长徐忠智在排伤亡、弹



药耗尽的情况下，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面对装备和数量胜过自己的敌人，我军官兵敢于斗争，以命相搏，绝不退缩。13日，有着“赵子龙师”称号的国民党九十五师联合第八师派出了“敢死队”，疯狂向二十八团的阵地发起攻击。我军二十八团先后8次击退敌军。二连指导员程远茂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带领该连仅存的7名同志，用刺刀、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15日，国民党军投入5个师的兵力作垂死挣扎，我军三十四团一营的4名战士，依托一棵大树，只用一挺机枪便击退了敌人的9次进攻，歼敌50多人。自此，这树便成了“英雄树”。

塔山阻击战为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涌现出了守备英雄团、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威震敌胆炮兵团等英雄团队。鲍仁川、程远茂等20人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和“毛泽东奖章”。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吃小米饭 攻理论山

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节”

□ 李津军

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因此，对在职工干部教育，专门设立“干部学习节”加以推动，为在职工干部教育积累了有益经验。

在职工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延安时期，党中央提出，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对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and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把干部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进行了干部教育的改革创新。

干部学校教育是抗日革命根据地整个干部教育的一大特色。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指示中提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然而，虽然根据地设有各种干部学校，但因战争和生产随时随地都需要干部，所以势必难以使所有干部都进入干部学校学习。因此，根据地大力开展了在职工干部教育。

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工干部教育的决定》总结道：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工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

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因此，对在职工干部教育，专门设立“干部学习节”加以推动，为在职工干部教育积累了有益经验。

设立“干部学习节”促进在职工干部教育。如果说，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的全部教育中的特色，而在职工干部教育又是全部干部教育中的特色。为了加强干部学习，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的课程应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进行安排。3月14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在职工干部教育的指示》，对之前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作了补充规定，并决定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定为“干部学习节”。

在“干部学习节”这天，要进行学习总检查。这项活动的特点就是注重总结、检查、评比，同时考核干部的学习成绩，表彰学习模范，推广学习经验。首届“干部学习节”后，6月6日晚，中央宣传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延安在

职工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大会选举李富春、王首道、胡耀邦、艾思奇等23位同志为主席团成员。罗迈作了延安在职工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除指出一年来学习的成效外，针对阻碍学习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作了进一步动员；强调要下决心，用“挤”和“钻”的精神对待学习；方法上，提倡以自学为主，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加强学习的指导，采取发讲课提纲、发参考书目、请学习顾问、设巡回辅导站、交流学习经验等措施，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

总结报告后，大会宣布了甲、乙、丙3类39个学习模范小组名单，介绍了他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精神。“洛甫小组”“陈云小组”名列榜首。在这次“干部学习节”活动中，朱德被大家公认为“模范学生”，他在会上谦逊地说：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一个模范学生，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持续学习。在“干部学习节”的推动下，延安出现了“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各机关、各单位无人不学，声势浩大，机关就是学

校，干部就是学生。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干部的业务、文化、政治、理论水平，无疑是一种创造。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工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当时在职工干部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在职工干部教育，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工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并明确指出：在职工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对四种教育分别提出具体要求，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关于时间安排，规定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工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通过强调高度重视端正摆位，设立“干部学习节”推动促进，再加上制度措施的有效保障，延安时期我党的在职工干部教育逐渐科学规范起来。